

# 利瑪竇頌

## 2009 聖誕節牧函

金魯賢<sup>1</sup>

這封牧函，把我們所知許多有關利瑪竇的常識貫串起來，使讀者對這位偉大傳教士有一整體的認識。牧函的作者不只見聞豐富，也熱情充沛，對「在天利瑪竇，在天徐光啓，在天無數傳教士」滿懷感恩之情，求他們為中國教會祈禱。由於牧函具體指出我們如何步武先賢芳蹤，繼續他們未竟的福傳大業，其中「補儒」一說尤其值得重提。這兩個字說出了中國主流文化儒家雖能指導人生旅途，其不足之處（如敬鬼神、人死後等問題）可用猶太—基督信仰予以補足。

房志榮神父謹誌於輔大神學院

### 各位神父、修女、修士、教友：

在天利瑪竇，在天徐光啓，在天無數傳教士，請為我

---

<sup>1</sup> 本文作者：金魯賢主教。1916年生於上海，1946年畢業於上海徐家匯神學院，隨後赴法國、德國科隆、奧地利因斯布魯克、義大利羅馬等地求學。1950年獲羅馬額我略大學神學博士學位，1951年回到中國。任徐家匯大修院（母心修院）院長、耶穌會上海區代會長，中國耶穌會代巡查使、海州監牧區代宗座監牧。1955年9月8日中共政府鎮壓行動時被捕入獄，在監獄中度過了18年，又接受勞改9年。1982年釋放，1985年祝聖為上海教區助理主教，1988年成為上海教區主教至今。本牧函寫於2009年12月8日聖母無玷始胎瞻禮日。

們祈禱！

2010年5月11日是偉大的中國宗徒利瑪竇神父逝世四百週年，普世教會將以不同的形式紀念這位偉人。中國教會，尤其上海教區更應隆重紀念他、效法他，並懇請他為中國教會轉求天主。為使教友們了解他，特寫此牧函。

## 出生

我們都知道東亞宗徒聖方濟各·沙勿略在日本傳教時，不斷聽說中國幅員如何遼闊、文化如何高深、人民如何眾多、科學如何發達、道德如何高尚，就此想到中國傳教。他知道大明帝國門禁森嚴，不准任何外人入境。但他認為：憑自己的身分，羅馬教宗的欽使；憑自己的學識，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又精通文哲諸學；憑自己的經驗，幾年中走遍東亞諸多國家，可以憑勇氣，一人去叩門闖關進入中國，履行傳播福音的神聖事業。他搭乘葡萄牙人的商船，來到了距離廣州只34公里的上川島，獨自一人居住在茅屋內，等待機會進入我國。儘管有人去島上看他，卻無人肯冒砍頭的生命危險，把他偷偷地帶入國境。方濟各被拋棄了，病倒了，飢寒交迫，發高燒，不能進食；只有名叫安多尼的僕人尚未離開他，留守在他身邊。他昏迷不醒，喃喃自語，安多尼只聽懂聖人在呼號天主聖三和聖母瑪利亞之名時離開這個世界。他死於1552年12月2~3日之間，年僅47歲。「壯志未酬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襟」。

方濟各失敗了嗎？方濟各的事業未能成功，似乎失敗了。然而，天主的救恩計畫不會失敗的，就在這一年，萬里外的義大利的馬切拉塔（Macerata）一個姓Ricci的家出生了一個男兒。

Ricci 原意是富有的，但這家並不富有，家長名洗者若翰，是名藥劑師。新生嬰兒洗名瑪竇，是長子，後他出生的有四個妹妹、八個弟弟，他是一個多子女家庭的長子，父母對他抱有厚望。

## 入會

瑪竇自幼在耶穌會辦的學校裏讀書，16歲中學畢業後去羅馬上大學，學法律。在大學時他參加了聖母會，恭敬聖母。3年後，瑪竇19歲，父親希望他早日學成賺錢，分擔養家的責任。正當畢業之際，他感到天主的號召，決意加入耶穌會。他寫信通知他的父親。他的父親原以為瑪竇就此可以工作，分擔支撐這個多子女的家庭；他得到信息後，大為失望，心急如焚，策馬奔向羅馬，企圖阻止其長子棄家修道的志願。途中他突然患了重病，臥在旅舍中。他認為這是天主暗示他不應阻止其子的修道，於是改變主意折回家鄉。

利瑪竇得到耶穌會副總長熱羅尼莫·那達爾(Jeronimo Nadal)的批准後，於1571年8月15日聖母升天瞻禮日進入初學院。他的初學導師姓范禮安，名亞歷山大(Alessandro Valignani)。范神父長利瑪竇14歲，但進耶穌會才只有四年，就被任命為初學導師，可見其德才。會士們都知道初學導師的重要性，他們與初學生朝夕相處，身教言教，手把手地教授神修學，解釋新修會的憲法和會規。尤其領導他們做三十天的依納爵的神操。使他們領會本會的神恩、本會的精神，使他們熱愛本會，終身忠貞於本會。

在范禮安神父的辛勤教導下，利瑪竇深深領會依納爵精神。他深信耶穌會的核心思想是愛—愛天主、愛近人、愛本會兄弟、愛尚未認識天主的人。他學會如何分析分辨問題、身體

力行愈顯主榮的原則，什麼地方更光榮天主就去，知道什麼事情更光榮天主就做。愈顯主榮深深刻在他心中，指引著他的一生。他又牢記著依納爵的一個工作準則，即著手進行前祈禱，求天主聖神指引幫助；下定決心進行時，一心一意投入，想方設法，按步進行，自己一人奮鬥，或團結他人，好似沒有天主一樣；在進程中不求天主干預發靈蹟。等待事情辦成後，就感謝天主，忘記自己，絕不偷天之功以爲己功而誇耀自己。

兩年初學，導師認爲他合格，由會長批准發初願。利瑪竇修士進入當時稱爲羅馬公學（即今日額我略大學前身）學習。名師出高徒，羅馬公學名師雲集，當時最著名的有三位：一名克拉維烏（Cristoforo Clavio），他是天文學家和數學專家，人稱他爲16世紀的歐幾里德（歐氏乃古希臘的名數學家）。第二名阿夸維法（Claudio Aquaviva），他將成爲耶穌會的第四任總長，他支持范·利的傳教方針。第三名由於博學多才，後升爲樞機，死後被冊封爲聖人，此後又被列入教會大聖師之行列：名伯拉民（Bellarmino）。

青年瑪竇天資聰穎，好學不倦，知一反三，從天文學學曆法，學地理，又在課餘好鑽研機械力學。他心靈手巧，一學就會，自能仿制。他酷愛音樂，能作曲，能奏多種樂器，並能修樂器。他的記憶力特強，過目不忘，真是奇才。青年瑪竇，好奇又好學，積累許多知識，他並沒有想到將來派到大用處。

## 赴印

1577年5月，耶穌會負責東方傳教事業的神父，回羅馬述職，同時招募志願去東方傳教的青年會士。利瑪竇去報了名，並被選中。他中斷了羅馬大學的學業，去葡萄牙的科因勃拉

(Coimbra) 大學，等候去東方的機會。在該大學內，他認識了著名的神學家類思·莫利那 (Luis Molina)，此人主要致力於協調天主聖寵的威力與人的自由意志。成熟後的利瑪竇，在中國也不斷探討這個問題。出發的日子到了，1578 年 3 月 29 日，利瑪竇與另三位義大利會士以及其他國籍的十名會士，總共十四人，登上了由葡京里斯本啓航的帆船。利瑪竇時年廿六歲，只是修士，尚未晉鐸。同行中另有巴范濟 (Francesco Pasio) 與羅明堅 (Michaele Ruggieri)，後來這兩人比利瑪竇更早進入中國。

航行約半年 (我在〈稱頌聖方濟各·沙勿略〉牧函中曾略述當時旅行之辛苦，恕不重複)，1578 年 9 月 13 日到達果阿 (Goa)。果阿位於印度西南部，是天然良港，附近海口風平浪靜，氣候宜人，土地肥沃，鳥語花香，居民善良，葡國占為己有，使之成為一個軍事基地與歐亞貿易中心。果阿耶穌會省會長歡迎新的傳教志願者，由於利瑪竇只是名修士，就令他在當地神學院繼續念神學兩年。1580 年 7 月 26 日接受鐸品，時年廿九。

晉鐸後，省會長派他在果阿的中學教拉丁文和數學。利瑪竇當然服從，然而他來到亞洲不是為了在一塊葡萄牙殖民地地上為葡人子弟服務，他一心嚮往的是去中國傳播福音。和他同船到達果阿的羅明堅神父，已於 1579 年被派到澳門讀漢語，準備進入中國；另一同伴巴范濟也於 1582 年到了澳門。

羅明堅到了澳門，住在耶穌會會院，會院就在海濱，推窗一望，遙見中國大陸，他心想，他和巴范濟兩人怎能擔負起中國大陸的福傳工作，必須加強隊伍。他馬上想到同船到印度的利瑪竇，立即寫信向當時耶穌會東方巡視員范禮安神父，申請把利瑪竇調來。范公曾是利瑪竇的初學導師，很賞識利瑪竇，立即批准。利瑪竇接到調令，喜出望外，迅速做好準備，於 1582

年4月乘船離開果阿，經麻六甲(Malacca)上岸，換船繼續前行，終於8月7日到達澳門。去接他的羅明堅發現他患了重病，骨瘦如柴，領他到會院靜養。

## 良師

負責東亞傳教的范禮安，對前來傳教的會士以書面形式做出重要指示，會士必須嚴格遵守。指示內容豐富，但主要有三點：

1. **傳教準備時期，必須用功學習當地語言。**這點和過去傳教士不同。此前凡來傳教者，心急如焚，馬上上街宣講，不會語言就用翻譯，俗稱教理先生。方濟各·沙勿略就這樣，他走遍東亞許多國家，凡到一處，就上街，一手拿十字架，一手搖鈴，人群—尤其小兒—圍上來時，就講要理，講一句由隨行者翻譯。范禮安堅持要傳教士先花一到兩年時間學習當地語言，這是創新。
2. **到達一個國家或地區，必須先了解其風俗習慣，並尊重之，不可忽視，更不准藐視。**
3. **到一國就爭取成為該國人。**到中國，必須爭取成為中國人，說中國話，遵守中國人的規矩，衣著飲食隨從中國人。

范公是位先知性的偉人，他的思想與他之後三百多年的梵二精神相符合。他強調傳教士絕不可讓新奉教者失去中國人的身分而變為外國人。這點和過去傳教士大不相同。西班牙、葡萄牙傳教士勸化一個當地人，就要他放棄原姓氏，並給他一個西班牙或葡萄牙人的名字。至今許多印度籍或菲律賓籍的教友，仍有西班牙或葡萄牙姓名。

利氏到了澳門後，就用心閱讀范公的指示，再三誦讀，全

心接受，終身奉行。范公也器重利氏，重用利氏。利氏踏進了中國境內，尤其進入中國的上層社會後，不斷向范公請示匯報，不時提出申請。范公總是訓勉有加，有求必應。范公知道中國傳教區逐漸擴大，必須大力支持。利氏要求增加會員，增加經費，需要建造聖堂會院，需要得到大臣官員的好感，以便自由傳教，范公也知道中國官場上的潛規則，以禮鋪路，所以利氏要人范公就給人，利氏要錢就給錢，利氏要禮品，就想辦法從歐洲購買禮品。范氏又放權任命他為中國教區的負責人。如果沒有范公，就沒有後來成名的利瑪竇。

## 準備

利氏全心學習漢文，這是很艱辛的工作，漢文不是拼音文字，不像歐洲語言只有二十幾個字母，而是一個字一個樣。必須記住幾千個、甚至上萬個方塊字。漢語又基本上是單音的，可是同一個音有幾個或是幾十個不同的字，含義不同。利氏寫給歐洲友人的信上說：「同一個音 ma，就有寫『嗎』、『麻』、『瑪』、『罵』等含義，必須寫出來；而且一個音又有四音區別，真是難上加難。」

正當利氏埋頭學中文時，有了進入中國境內的機會。明代中國閉關自守，禁止外國人入境，外國人卻要與中國做生意。明政府特許每年開兩次廣交會，開會時外國人可來中國，和中國商人做生意，但有一個嚴格的規定，外國人早上上岸，晚上必須回船上，不准在廣州域內過夜。羅明堅和巴范濟利用廣交會和葡萄牙商人一起去廣州。他們兩人毅然去見廣州官員，說自己是教士，每天有宗教功課要做，如果每天從海上走來晚上回船，神業功課便不能完成，求官員破格准他們留在廣州過夜。

官員聽他們一口流利的官話，加上彬彬有禮，就批准了他們的請求。但廣交會有期限，一旦結束，他們和外國商人一概撤退，羅明堅和巴范濟兩人仍回澳門。

明代兩廣總督府設在肇慶。當時總督名陳士峰，此人為人狡猾又貪婪，但消息靈通。有人報告他有傳教士攜有自鳴鐘到澳門，他就傳諭羅神父去肇慶見他。

1582年12月18日，羅明堅神父與巴范濟神父帶了一位修士和幾個中國青年自澳門動身，於12月27日到達肇慶，向陳士峰獻上自鳴鐘。總督大悅，允許他們留在肇慶，住在東門一所佛寺內，羅神父修了一所小聖堂，並在祭台上刻「天主」兩個大字，這是耶穌會在中國的第一所會院。羅神父晉謁許多官員，其中提督對他們特別友好，向他們說：「你們是出家人，穿著應像出家人，我們中國出家人穿僧服，以後穿僧服吧！民眾一見就會尊敬你們。」他們接受了這個意見。不久，有御史向皇帝上書彈劾總督。皇帝下詔免除陳士峰之職。陳下台後，新總督上任，下令驅逐外國人。羅、范兩人被迫返回澳門。此後巴范濟神父被派往日本傳教。

## 入境

利氏到了澳門，知道自己快要達到目的，心情愉快，一直多病的身體，逐漸結實起來，不再生病。他全心投入準備工作，首先學習漢語。以他驚人的記憶力，很快能識幾千個中國字。他能講、能和人交談，能看中文書籍，能書寫中文，並能寫文章。他努力了解中國的風俗習慣。范禮安再三強調：「到了中國，成為中國人」；「In China Chinese，外國傳教士應成為本地人，不是叫本地人成為外國人」。利氏逐漸知道，中國人所謂

學問，不是指自然科學，不是指實用科學，而是孔孟之道。搞實用科學只是雕蟲小技，大學問則在熟讀「四書五經」。利氏掌握孔孟之道後，佩服中國人常說的一句話「文以載道」。

利氏心中深處認為，道是基督所默示的真理，學漢語、學儒學，把它們作為運載工具，借之以宣傳福音。他從來沒有忘記自己是傳教士的身分。對他來說，福傳是第一位，其餘是運載工具。利氏好交友，廣交朋友。他用儒家的話說：「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中國人的「文」內容豐富，指文字，指文章，指修養，指人品。以文來交朋友，交朋友為了輔仁，即互相幫助修德、修仁。

## 肇慶

一切準備好了，機會也來了。幾番努力，幾次申請，幾經周折，終於得到新的兩廣總督郭應聘的批准，可去肇慶。羅明堅與利瑪竇滿懷喜悅與希望，於 1583 年 9 月，立即接受了好心人的建議，打扮成和尚，上船前往。根據利氏給歐洲友人的信，我們知道利氏一路上心態良好，細心觀察。他信上說，一路山明水秀，風景極美，中國人民極為誠樸忠厚。事實上，中國人帶著更大的好奇心，注意觀察前所未見的瘦長個兒、藍眼睛、高鼻子、剃了光頭、穿著僧袍的洋和尚。

路上十餘日，到肇慶後，他們兩人先去拜謁肇慶知府王泮。按當時規定，知府升堂，坐在高處，兩名洋和尚被引進衙門，兩人跪拜在地，叩頭三次。知府問話道：「你們為什麼來我國？」答曰：「我們慕貴帝國的大名而來。」又問：「你們來此究竟想要什麼？」答曰：「我們希望在此建造兩所小屋。」再問：「為什麼要兩所？」答曰：「一所為自己居住，一所作為祈禱

用。」知府沉思片刻，最後發言：「准予建造」。兩位傳教士恭敬地獻上禮品，王泮欣然接受，然後退堂。

由於好奇，也爲了表示友好，知府親自領了兩名西僧去郊外海濱，指出一塊地說道：「准你們在此造屋。」利氏親自製圖、監工、落成；知府王泮親自寫了兩幅匾額：一方寫「櫻花寺」掛在堂門上，一方寫「西方淨土」掛在他們的居所門上。天主教在我國建造的聖堂以寺爲名，反映出羅、利兩位遵照范禮安的指示，努力使天主教適合中國國情，是爲本土化的嘗試。

櫻花寺與西方淨土的大門白天一直開著。想做福傳工作，能把大門關著嗎？羅、利兩人等候客人，肇慶府人口不太多。古時的老百姓，沒有像我們今天那樣，有許多娛樂場所，平常時候無處可消遣，見忽然來了兩名外國和尚，這是件破天荒的大新聞，人們奔走相告，都想一見爲快。來訪客人絡繹不絕。兩名出家人對來訪者不論貧窮、不論貴賤、不論老幼，都笑臉相迎。凡有問者，都耐心解說，不厭其煩，還展示給他們帶來的世界地圖、地球儀，以及聖母像等。人們聽到西僧講一口官話，談吐風雅，又見他們彬彬有禮，平易近人，都對羅、利兩人有好感，其中有霍太素。利氏時年卅一。

## 韶州

1585年，兩廣總督奉朝廷之命，著手採辦歐洲新奇珍物進貢皇帝，也委託羅明堅神父去澳門代辦。不久，上述肇慶知府王泮蒙升要職，將北上，特邀羅神父同往浙江省會杭州府。羅神父欣然接受邀請，於1586年1月偕麥安東神父（Antonius D'Almeida）應邀同往。郭總督之父也成爲神父們的好友，並邀他們在杭州宅中下榻，繼而接受洗禮。羅、麥兩位神父利用這

個機會傳教。

羅神父在杭州工作順利，先後又去了武漢、桂林等地，一路受到歡迎，也遭到誣告、驅逐，最後返回肇慶。

羅、利兩位神父感到自己處境很不穩定，所依賴的官員又喜怒無常、變化不定，有必要取得朝廷的特准，承認他們的合法地位，才能久留中國。爲此，需要教宗派遣一個正式的使團晉見明朝皇帝。他們匯報了范禮安監會司鐸，他認爲羅神父最有資格去羅馬述職，並完成這項使命。於是羅神父回澳門，並於 1588 年從澳門動身，於 1589 年安抵葡京。不過羅神父因積勞成疾，不久病死於義大利，原定計畫未能成功。這時，利神父在肇慶建造了一座優美的歐式樓房。

1587 年，劉節齋任兩廣總督。他見到了利氏的美麗居所，頓生貪心，把利氏趕回澳門，把這歐式樓房占爲己有。不久，怕人告發他貪污，又把利氏召回肇慶。但仍不甘心物歸原主，建議折價買下，利神父不願出手，願遷往別處。利氏選擇了韶州，鄰近江西。吸取教訓，利氏不再建歐式樓房，而用了中式。

1583 年起，利氏爲了適應中國風格，剃了光頭，不留鬍子，穿了僧服逾十年之久；經過長時期的觀察和深入的研究，又得到友人的忠告，利氏感到當時穿僧衣的決定並不正確。佛教傳入中國已一千三百多年，廟宇遍全國，但和尚並不受人尊敬，更不說有什麼大的影響力。中國是個帝國，皇帝至高無上，擁有絕對的權力，然而他深居宮中，日夜陪著他的數百名嬪妃，以及數以千計的太監，往往沉溺於酒色之中。治理國家的機構，掌握在一大批官僚和地方上有勢力的所謂鄉紳（他們往往是退下台的官員和大地主）的手中，這兩批人都是口頭上信服孔孟之道，自稱或被稱爲儒者或士。要和官員來往，進入士大夫階層，不

能再穿僧服了，必須改穿儒服。要進入上層社會，要得到知識分子的認可，非改革不行。利氏與後來到中國的郭居靜（Lazzaro Cattaneo）寫信向范禮安神父請示，范立即回信批准，今後在中國的傳教士蓄頭髮、留鬍子、戴方巾、穿儒服。耶穌會總長、羅馬教廷也先後同意。按利氏在華 28 年，11 年穿僧服，17 年穿儒服。

## 南昌

利氏在韶州住了六年，他努力研究儒學，向博學之士學習，深入學習中國的經典著作，開始用漢字寫書，他的名著《天學寶義》在此期間正式脫稿，此書後改名為《天主寶義》。1595 年初刻於南昌，1604 年再刻於北京，1606 年再刻於杭州。以後多次再版，先後譯成日文及安南文（今天越南）等。

1594 年郭居靜神父到韶州，利氏決意北上，他的最終目的是去北京見皇帝。他把教務託給了郭，隨著去北京的原兵部尚書石星乘船出發。路上遇水災，沉船，利氏落水，僅頭部露出水面，在急流中又不會游泳，似生返無望時，他突然抓到一根纜繩，緊拉攀上而脫險。這時石星改變主意，他深怕把外國人帶至首都很可能被彈劾，命利氏返回廣東。經利氏再三懇求而只准他到南京。南京官員不准他居留，勒令他南返。利氏只能折回南昌暫住。在韶州認識的名醫王維樸大夫聞利氏到南昌，即去拜訪。王是南昌官員的座上客，即將利氏引見他們。利氏把所著《西國記》與《交友論》刻印，分給諸人。按《交友論》1599 年刻於南昌，1603 年刻於北京。

1597 年范禮安神父呈報羅馬後，任命利氏為中國的會長，又派遣龍華民（Nicolas Lombardi）神父（利氏死時任命他為自己的接班

人)來協助傳教。范氏又指示利氏去北京長居。利氏想以進貢身分赴京朝見皇帝,並籌備了從西洋帶來的自鳴鐘、三棱鏡、油畫、聖像等作為貢品。利氏得知自己熟識的禮部尚書王忠銘將進京,此人願代為引見。利氏大喜,即與郭居靜神父同行北上,他們於7月5日路經南京,於9月7日到北京。王忠銘原以為自己可以入閣為相,但未能如願,即離開北京,王所介紹的朝廷大員無心代為引見。利氏無可奈何,於1599年2月回南京住下。

## 北上

利氏得王尚書的幫助,在南京購得新居。他把各種貢品展示於來訪的官員和名士,趁機向客人介紹西洋學術、各國風土人情,又講解天主教教義。他所繪製的萬國輿圖,更為士大夫賞識。隨著南京教務的發展,利氏進京之心更熱切,終於在1600年5月18日與龐迪我(Didaco De Pantoja)神父帶著貢品由運河北上。行前得到南京禮部所發給的路照。

船過了濟寧來到臨清,那裏有稅關。當時的稅官姓馬名堂,是個太監。他的貪得無厭遠近聞名。他聞知神父船上有貢品奇珍異物,想占為己有。儘管神父們抗議,和當地官員鐘萬祿說情,馬仍強行把所有貢品搬到自己船上,企圖吞沒。馬堂拿走聖爵杯時,利神父堅持要回,並嚴詞正告馬,這杯是極為神聖的,為神職人員獻祭時所用,任何人不可接觸。馬堂發現貢品中沒有金銀財寶,又怕事發之後被皇帝治罪,終於7月31日上疏奏明神父進貢一事,同時把兩位神父當作已判決的罪犯押離臨清,八天後抵達天津,即把神父關在一所寺廟內,達四個月之久。

兩位神父飢寒交迫，受盡折磨。1601年元月，萬曆皇帝突然想起有西洋人進貢自鳴鐘一事，即批示馬堂讓西洋人入京。1601年1月24日兩位神父終於踏進了北京城，住在皇宮外的太監宿舍裏。當晚挑燈開箱，登記貢品，共16件，有天主像、聖母像、日課經、聖人遺物、萬國地圖、大小自鳴鐘各一，另有西洋琴一架，及玻璃鏡與玻璃瓶等。事到如此，馬堂還想軟禁利氏，不讓他接觸官員，也不讓他見到皇上。利氏等了幾天，見毫無動靜，就要了紙張筆墨，用中文寫疏上於萬曆，萬曆立即召見了他們。

皇帝端坐在御座上，兩人跪下，行三跪九叩之禮，並三呼萬歲；萬曆見他們一表人才，又按照中國禮節下跪，就賜坐，詢問他們來意。萬曆見他們用流利的官話回答，不卑不亢，龍心大悅，又見大自鳴鐘，鐘內按時有人跳出來報鐘點，又聽利氏奏琴，琴聲悅耳。皇帝先令他們住在宮中，教會太監奏琴並操作其他貢品。利氏感到身在宮中諸多不便，再三懇求讓他遷出皇宮，得到萬曆恩准，他們就在宣武門東首，購買土地建房。從此利氏可常住北京，直到1610年去世，有九年之久。

## 北京

經過將近二十年的奮鬥，歷盡千辛萬苦，一路上不知向各種官員叩了多少頭，利公終於如願以償，定居北京。當他在南昌和南京時，他先為西僧、後為西儒的大名，早已傳到京都。所以他在宣武門外購買了房屋後，立刻有許多人來拜訪，不少是高官或名儒，可說：「往來無白丁」。

利氏一一熱忱招待，向他們贈送自己的著作《天學實義》、《交友論》、《畸人十篇》、《辦學遺牘》以及《山海輿圖》

等。

## 益友

他能先後在廣東、江西、北京立足，並發展自己的事業——福傳工作，且能把西方最新科學成就介紹給中國，主要依靠自己的朋友。利氏的朋友太多了，限於篇幅，只能介紹少數人。

在廣東韶州時，他認識了常熟人瞿太素，諱汝夔，是他勸利氏棄僧服改穿儒服的。1599年利氏再版《交友論》序文是瞿太素所寫。方豪神父的《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瞿氏傳中說：「瞿太素和利氏常出入相偕，極為親切」。

歷史學家認為中國天主教早期，有三大柱石，通稱為徐李楊，即徐光啓、李之藻、楊廷筠。徐光啓於1600年在南京認識利氏，李之藻與楊廷筠分別在1601年和1602年在北京認識利氏。

徐光啓1603年再去南京時，利氏已北上，在羅如望神父手中領了洗，聖名保祿。1604年他再去北京考試，中進士（年四十二）即住北京，從而再次認識利氏。1607年徐父去世，他必須回上海守喪三年。1610年徐回北京，利已逝世。徐、利相處只三年，但三年中結出了非常豐碩的果實。

首先，徐的信天主之心更深更切，他每天輔彌撒、領聖體、長時間祈禱；其次，他請求利氏幫他翻譯最新的科學名著，最重要的是歐幾里德的《幾何原本》。光啓曾是儒士，但熱愛科學。見利氏所帶歐洲科學名著，深恨自己未讀外文，由於知道西洋國家在科學方面已走在我國前面，他愛國憂國，愛人民，心急如焚，急想率領中國人民迎頭趕上去。他說：「欲求超勝，必須會通，會通之前，必須翻譯」。

四十五歲的徐光啓，於 1606 年開始與利氏合作翻譯歐幾里德的《幾何原本》。開始翻譯時，利氏向徐述及「翻譯極難，幾乎中斷」；光啓堅持說：「自己不怕工作」，又說：「我見難而避，難就長大，我迎難而上，難自然消微，我必能成功」。他每天下班後，趕到利氏寓所，利氏口述、光啓筆錄。翻譯過程中，他們兩人反覆推敲，務求合本書原意，並與楊廷筠、李之藻等質疑辯難，以中夏之文，重複訂正，凡三易其稿。1607 年春，《幾何原本》前六卷，即平面幾何部分，始告譯成，刻印發行。譯文正確之至，所創造的數學術語，大部分至今仍在用。

接著由利氏口述，由徐光啓筆錄，合譯了《陸地測量的測量法儀》。此書介紹平面三角術和球面三角術，引述了許多新公式。徐光啓父喪回上海後，利氏與李之藻合譯了《同文算指》、《圓容較義》、《渾蓋通憲》三書。上世紀初，大文學家、政治家梁啟超稱讚徐的譯文「字字精金美玉，是千古不朽之作」。

李之藻，浙江仁和人（明朝時代杭州分仁和、錢塘兩縣），1565 年生，小利氏 13 歲，少徐光啓 3 歲；他 1598 年中進士，李早徐 6 年；李死於 1630 年，徐死於 1633 年，享年 71 歲。

李所學很廣：天文、地理、軍事、水利、音樂、數學、哲學、宗教無所不研究。據楊廷筠記，利公曾說過：「自吾抵上國，所見聰明了達，惟李振之，徐子先二人耳！」可見利公對李之賞識。李與利之交遊與合作略長於徐，李深深認識利。

1613 年在李之藻所作《同文算指前編》中自作序說：「至於緣數尋理，載在《幾何》，本本元元，具存有『實義』諸書。如第謂藝數云爾，則非利公九萬里來苦心也」。用今天的話來說，其大意為：關於求得數學和自然規律，則已記在《幾何原

本》這書內；關於人生的大問題，其答案則在《天學實義》這本書中可找到。如果說利氏只求講科技，那就不是利公奔走了九萬里來我國苦心追求的目的了。

在李之藻心目中，利公首先是傳教士，宣傳基督於中國，才是利公苦心追求的第一目的。可以說：「對利而言，福傳是第一位，介紹西學是第二位」。介紹西方科學實際是利公的敲門磚，是福傳的方法或工具。利公交李、徐為友，因為利公奉行「以文會友，以友輔仁」的準則。徐光啓與李之藻等與利氏交游，初始階段因為他們佩服利公的人格與學問，深交後認識基督。他們兩人領洗入教時，已過不惑之年，他們是儒，是名儒，是大儒，他們不拋棄儒家學說，而是要補儒。他們認為「儒學高深，培育出高尚之人」，但他們一直認為「正心誠意，修身齊家」談何容易，孔子指出方向，卻沒有觸及根本問題，即人與天之關係，沒有提供達到目的的力量與方法。而天主教則告訴我們：「天，天主是愛」，而且提供七件聖事，賞賜恩寵，使人能夠以此達到成聖的目的。所以他們常說天主教可以補儒。

因為徐、李是真儒，所以憂國憂民。當時中國百姓貧困，國勢日弱。他們深知民富國才強，從來沒有聽說民窮而國能強的。要民富，必須科技進步。在民衆處在水深火熱之中、強鄰壓境之時，必須提高人民的素質，必須學習西方較我們先進的科學。他們多次上疏皇帝，必須把西方科學介紹進來並加以普及。徐、李心中愛教、愛國，相輔相成，二者同居首位，參閱李給皇帝寫的信，就知道徐、李的用心。

李之藻給皇帝上疏的原文很長，又為文言文，現在僅摘錄一段如下：

「伏見大西洋國歸化陪臣龐迪我、龍華民、熊三拔、

陽瑪諾等諸人帶有許多書……不單有歷述，還有水法之書，機巧絕倫，用之灌田，幫助運輸，可以得到大益……又有測望之書，能測出山岳江河遠近高深……有儀象之書，能極論天地之體，與其變化之理；有日軌之書，能立表於地，刻定廿四氣之影線；能立表於牆面，隨其三百六十向，皆能兼定節氣，種種制造不同，皆與天合；有《萬國圖志》之書，能載各國風俗山川險夷遠近；有醫理之書，能論人身形體血脈之故，與其醫治之方；有樂器之書……請皇帝下令禮部，趕快設立一個翻譯局，把所有利的書釋出，逐漸推廣……」

可見李有宏偉的計畫，但皇帝看到李的奏疏，只批了「知道了」，沒有下文，也就是說不予採納。

## 工作

利公終於如願以償，到了明朝首都北京。他帶著歡樂感恩之心，全身投入繁忙的工作。他主要工作是傳教，他要廣交朋友，利公享有盛名，達官名士都想拜訪他，以認識利公為榮。他要保持與皇帝的關係，皇帝的優待是中國教會的保護傘。正由於利公在北京得到皇帝的照顧及高官名儒的支持，地方上的傳教士得有自由傳教，不受或少受干擾；即使有困難也易解決。他這方面做得出色，導致有許多人想入教。

他不斷和歐洲友人通信，由於他的介紹，西方才正式、系統地了解中國。在歐洲，他被稱為最大的漢學家；在中國，則被尊為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驅。他是名耶穌會士，重要事項他應向羅馬請示匯報；即使事急，他臨時應對後，仍向羅馬匯報。當時交通不方便，沒有正式郵政通道，郵件經商船繞南非而到

義大利，信件大抵途中遺失，往往三年後才收到回信。這是有電腦、有手機的現代人不能想像的。

他又奉命寫《中國傳教史》，這是一項大任務。他又得校正他所譯的拉丁文版的儒家經典《四書》。每天下午又與徐光啓合譯《幾何原本》等名著。他的工作量之大，速度之快，效果之佳，絕對超出常人。1940年代，義大利耶穌會士德禮賢出版的利公全集（八開本），厚厚的、好幾大冊。另外，他作為神父，每天應做默想、彌撒、念日課、念玫瑰經、做省察等，至少得用三個半小時。

## 哀榮

人不是鐵打的，日以繼夜地工作，利公終於病倒，與世長辭，年僅 58 歲。臨終時任命龍華民為耶穌會中華省的會長，作為他的繼承人。史載：

「利神父病故，禮部奏聞，上震悼。各部大臣，翰苑諸公，暨在京士紳，俱贈賻詣唁。朝中諸公，議請葬地，龐迪我、熊三拔等具疏奏請。帝即使阜城門外騰公柵欄官地二十畝，房屋三十八間，賜給龐迪我等，永遠承受，以資築墳營葬。」

第二年夏天（1611年）改建工程完成，安葬日期定於 11 月 1 日「諸聖瞻禮日」。皇帝派大員致祭。順天京兆（相等於今天的北京市長）王立麟是利氏的友人，寫了碑文。

中國歷史上一個外國人，死在中國，皇帝賜田作為墓地實屬少見，應是殊榮。利公墓地幾經滄桑，保存完好。成為一個景點，供國內外人士前往憑吊。

四百年過去了，輿論有時反覆。但總的來說；利公一直受

人敬仰愛戴，而且讚揚之聲不斷上升；羅馬正在準備他的列品，登上祭台受人恭敬的日子已不遠，是傳教士的光榮，也是我們中國人的光榮。

利公之所以能留下如此的豐功偉業，追究緣由，首先是天主的恩寵、本人的慷慨回應和辛勤勞動。今年我們要比往年更懷念他，遙望天庭，能見利公微笑著向我們說：「飲水不忘掘井人，我的微小成績應歸功於我的良師益友，沒有他們也沒有我」。他的良師上面已提到，是范禮安神父。是范禮安神父叫他、支持他、信任他、指引他，面授他傳教方針：「到了中國，成為中國人」。為了做成中國人，他經過摸索、探討、實踐。先借佛、後尊儒成了儒。當時爭取做中國人，被接納為中國人，必須尊孔。利公熟讀「四書五經」，也欽佩孔子的為人和孔子的學說。他認為孔子不只是一位偉大的思想家和倫理導師，而且是儒學塑造了中華民族。

做一個中國人，尊孔是必然的。中國的倫理道德以孝為首，父母之恩終身不忘，為人子應孝，為中國人更應孝，生時孝，死後仍應孝，不忘父母。外國人家中掛有父母遺像，像前放些鮮花，表示孝心。中國的百姓無能力替父母生時繪像，死後放一牌位，把父母喜愛的食品供在牌前，是盡孝道的方式。尊重中國人的習俗，不宜妄加阻止。為使自己做中國人，為使中國教友不做外國人，他允許教徒尊孔祭祖。由於利氏遵循良師范神父的教導，天主教得在中國立足，教友不受人的歧視，天主教被接受。傳教士能做福傳工作，路線正確了，工作才能順利。

## 挫折

利公死後不久，他所奉行范禮安神父制定的傳教路線一到

中國做中國人，不能教中國教徒成爲外國人—受到質疑，最後釀成禮儀之爭大問題。意想不到的，首先挑起者，就是利公親自指定的接班人龍華民。他懷疑尊孔祭祖是宗教迷信，他又認爲學儒、補儒，事倍而功半，不如離開城市去農村，直接向普通老百姓宣傳福音。

由於利公的威望，追隨龍的人不多。不久，道明會、方濟會各會派來傳教士，他們不但反對利氏的路線，並把耶穌會直接告到羅馬。耶穌會總長指示在中國的耶穌會派代表去羅馬解釋。耶穌會的代表去羅馬向聖部解說了一番，自以爲問題已說清楚，自己有理，就回中國。他們大大低估了反對者的執拗精神，這些人有不獲全勝、絕不收兵的決心，再三上告。

教宗就派了欽使來中國，他朝見了康熙皇帝，康熙向他說明尊孔祭祖是俗禮，並非宗教，欽使堅持自己的觀點，康熙指著匾上的幾個大字(正大光明)問欽使「識否」？欽使說「不識」，康熙說：「你連中國字都不識，怎麼來中國指手畫腳？」欽使到了廣州，悍然宣布了羅馬禁令，不准教友再尊孔祭祖。康熙非常震怒，嚴斥膽敢批評中國習俗的任何外籍人士。他 1715 年，在教宗所頒布的教令上，用紅筆點圈，並寫上「以後不准任何教士到中國來，以免招致更多麻煩的事」。

服從教宗禁令的中國教友，從此不能向孔子致敬。在中國，入學之前，必須向孔子行禮，否則不准讀書識字，成爲文盲。凡不尊孔者，被指爲對國家不忠。教友家中也不能安放寫上祖宗名字的牌位，更不准向牌位致敬，供上父母喜愛的食品。在衆人眼中，教友是極不孝的子孫；當上教友成爲不忠不孝者，自絕於全體人民。想識字的、想當官的、已當官者，必須做出最痛苦的抉擇。有不少人放棄了信仰。尙未領洗者在教會大門

前止步，不敢進入。利公辛苦培育的幼苗，正在成長，已在含苞待放，快要結出豐碩的果實，一場嚴霜打來，立即枯萎。

繼康熙為帝的雍正，更是嚴禁天主教，殘酷鎮壓堅持信仰的教徒。中國弱小的教會轉到地下。我還記得 1931 年春，我的父親去世，四川南路天主堂的本堂神父焦神父（Baumert）來我家，見我們弟兄三人跪在父親的遺像前，告訴我們不能這樣，不准跪拜，或把遺像移開。1939 年羅馬才解除禁令，准許中國教友尊孔祭祖，可惜晚了兩百年。

禮儀之爭，使在中國傳教的事業到退。使有識之士不敢使天主教本地化。反對利公的一批人得勢。中國教會連已用了幾十年的「天主，父、子及聖神」這種最基本的詞也不敢用了，他們硬說中國語言中沒有詞可以譯出拉丁文「Deus、Pater、Filius、Spiritus Sanctus」的意義，只能用音譯。在他們的主張之下，Deus 應音譯為「陡烏斯」，Pater 音譯「罷德肋」，Filius 為「費略」，Spiritus Sanctus 為「斯彼利多，三多斯」。我們小時候劃十字時念的，不是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而是「因罷德肋及費略及斯彼利多三多，阿孟」。

據反對利公者的說法，用了中文的天主、父、子、聖神字樣，天主不懂了，念了音譯的中國字，天主就俯聽我們的祈禱。用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付洗，洗禮就無效。直到上世紀二十年代中，才不用音譯而用「天主、父、子、聖神」。我們中國方言有幾百種，同一字號有幾百種不同的音，我不知道天主在天上聽到幾百種的呼號，有何感覺？十七世紀初，耶穌會士曾向羅馬請求在中國用中文做彌撒，中國神父念中文版的日課，已獲得批准，中譯本也已完成，禮儀之爭後就不敢再用。范、利兩公所希望的，天主教本地化，彌撒、聖事用本國語言，在 1964

年梵二大公會議後，得在普世實行。范、利兩公的智慧超前三百六十年。寫到這裏，我深深地佩服他們。

## 假設

假設者，非事實也。我寫這篇牧函時，腦中不時升起幾個假設。明知這是空想，但仍願寫出來，使教友知道。

**第一個假設：如果利公的領導不是范禮安神父，而是龍華民這樣的長上，利公將是怎樣呢？**利公不學漢語，不會成中國人，不會尊孔，不會以耶補儒，憑個人匹夫之勇，闖入中國境內活動，肯定會被驅逐出境，一事無成，絕不會成爲中國宗徒。

**第二個假設：利公沒有交上徐光啓這樣的大儒，又將怎樣？**他不會與人合譯西方的科學名著，把最新科技成就介紹給中國，而成爲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人而流芳百世。

**第三個假設：如果沒有禮儀之爭，在中國的天主教會將是怎樣的？**我用孔漢思寫的一句話來回答：「那今天西方的遊客將在中國的都市中、名山裏，看到和佛教寺廟一樣多的天主教聖堂和隱修院」。

**第四個假設：如果當時皇帝採納了徐光啓、李之藻的建議，把西方新科技拿來並普及，中國將成怎樣？**1860年日本明治學習西方實行新政，不用四十年就把一個分裂的、落後的、貧窮的國家建設成一個軍事大國。利瑪竇到北京後，徐光啓與他合作，在十七世紀初，早明治維新260年。如果那時我國吸收西方先進技術，中國不會淪爲列強的次殖民地，我國早已成爲頭等強國，可惜當時萬曆皇帝不理朝政，在宮中尋歡作樂，又重用奸臣，官員們自上至下都是貪官污吏，弄得民不聊生，國勢日衰，不久明亡，人民遭殃。利公、徐公太超前了。

四個假設都未成為事實，非利、徐兩公的不努力，而是雙方領導的傲慢、偏見所造成。自古以來，傲慢和偏見一直是和諧進步的大敵。領導也好、個人也好、社會也好、教會也好，常應反省、克服，才能有所進步。

## 結論

牧函又已寫得長，應作結論了。

紀念一位聖人，不只歌頌他，更應效法他。我們效法利公什麼？

第一，**效法他的信心**。利公之所以成為中國宗徒，因為他有堅強的信心。他信仰天主，信仰天主是愛，因為他信賴天主，所以敢遠涉重洋，歷盡千辛萬苦來到中國，深入內地，進入首都，就如陷入人海之中。當時中國人口七千餘萬，七千萬陌生人中有些是敵視的面孔，無朋友、無親人。當他離開澳門時，知道自己已不能後退，只能前進。他仰賴的只是天主，只是祈禱和聖神的指示。

第二，**效法他的愛心**。他熱愛天主，也深愛中國，愛中國人民。外國人尚如此愛中國，愛中國的文化，我們中國人能不愛自己的祖國，能拋棄自己的文化嗎？

第三，**效法利公的尊師愛友**。上面說過，利公要是沒有他的良師范禮安神父的指示、支持，要是沒有瞿太素、徐光啓、楊廷筠等諸位益友的輔仁，成不了中國宗徒、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人。利公一生尊師愛友，他寫的《交友論》告訴我們友誼之寶貴，《交友論》是當時的暢銷書。

中國自古以來有尊師愛友的美德。古人在師字下加一父字，師父師父，指師是父。所以說，一日為師終身為父。古人

把朋友放在五倫之內，足見友人的重要。常說朋友如手足，好友稱刎頸之交。爲了朋友，願割下自己的脖子。不知怎的，幾十年來尊師愛友的美德逐漸衰微、淡化。有高官提倡把教育事業變成企業，於是教育市場化，老師與學生與學校成爲僱傭關係：「我出錢，你教書」成爲有些學員的口頭語。一切市場化：交友變交易，社會上需要的是關係，而不是友誼。官在任時門庭若市，官下台時門可羅雀，這是可悲的現象。我們教友應效法利公尊師愛友。記住「以文會友，以友輔仁」這個交友的準則。

第四，該效法利公的抓住機會。古人說：「機不可失，時不再來」；又說機會稍縱即逝，機會來了，必須抓住。最近溫家寶總理在國際會議上，多次強調機會的重要性，必須珍惜機會，利用好機會。放過機會，實際是罪。最近一位法國商人請我同進晚餐，席間他說：「我讀書時，神父教訓我每天得省察自己不好的思、言、行爲。我長大後感到疏忽。不作爲也是一種罪，我以爲它們的危害比一般人所謂的罪更爲嚴重」。我認爲這位商人說的很有道理。

第五，效法利公的好學不倦。青年時利公不只學了文、哲、神學，還學了數學、天文、地理、機械、音樂等學科。到中國後派上了大用處，到澳門後致力於學漢語，熟讀《四書五經》，講話出口成章；又能寫成漂亮的文言文，一般秀才、舉人寫不出《天學實義》、《交友論》、《畸人十篇》等大塊文章。我希望我們的神父、修女、修士努力學習，終身學習。世界變化太大了，進步太快了，一不努力就落後了，落後就被人輕視，被時代淘汰。切不要把寶貴時光花在電視機前、電腦上面。時間是天主賞賜的元寶，天主將向我們討賬的。

寫到這兒，有人好意向我說：「主教，你寫的又長了，太長了，我們看了記不住。」對，就此擱筆。我只送你們一句話，你們只要記住范公給利公的指示：「到中國，成中國人，不要使中國人成爲外國人」就夠了！阿們！

## 附錄：利瑪竇神父著作<sup>2</sup>

《天主實錄》：利瑪竇翻譯了羅明堅編《新編西竺國天主實錄》。起名爲《天主實義》，亦名《天學實錄》，這本書第一次系統地向中國人論證了天主的存在、人的靈魂不朽大異禽獸，和死後必有天堂地獄之賞罰，報世人所爲善惡的天主教教義。《天主實義》亦是最早把星期制度引進中國的。《天學實義》後來被乾隆皇帝收錄在四庫全書中，並有蒙、滿、朝鮮、越南及日文譯本。

《幾何原本》：利瑪竇與徐光啓合譯了歐幾里德《幾何原本》的前六卷。利瑪竇使用的《幾何原本》是他在羅馬學院學習用的課本，由利瑪竇的恩師——當時歐洲著名的數學家克拉維烏神父整理編纂。克拉維烏神父在原本後，又添增了兩卷注釋，總共十五卷。

《坤輿萬國全圖》：世界地圖。

《西字奇蹟》：（今改名《明末羅馬字注音文章》），是中國漢字拉丁化道路之始。

《三十五言》：是關於天主教道德信念、準則和修養的書。

《畸人十篇》：利瑪竇同十位中國士大夫的對話集。

---

<sup>2</sup> 附錄內容由光啓社取自百度百科網站：

<http://baike.baidu.com/view/83745.htm>

《交友論》：收入了古羅馬西塞羅到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大師愛拉斯謨等人論友誼的格言上百則。也有利瑪竇根據他對中國人的思想了解而編寫的。這是利瑪竇所寫的第一部華文著作。

《西圖記法》：一本介紹利瑪竇本人如何能有過目不忘能力的書。

《辯學遺牘》：1635年出版，收錄了利瑪竇以天主教觀點與明末淨土宗株宏和其門生虞浮熙的佛教觀點交流的信件。

《同文算指》：介紹歐洲算術，根據克拉維烏所著的《實用算術概論》（*Epitome arithmeticae practicae*, 1583年）譯成。內容由基本四則運算、分數至比例、開方、正弦餘弦等三角幾何。由李之藻筆錄，清朝時錄入四庫全書。

《測量法義》：關於應用幾何、測量，由徐光啓筆錄，附《勾股義》。

《圖容較義》：李之藻筆錄。

《渾蓋通憲圖說》：天文學知識，李之藻筆錄。

此外，他還寫過或參與寫過《西琴八曲》、《齋旨》、《乾坤體義》等著作。

利瑪竇用義大利文寫的日記，後經比利時耶穌會士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整理翻譯為拉丁文，出版於1615年，取名《基督教遠征中國史》，漢譯名為《利瑪竇中國禮記》。

1910年，汾屠立神父（Pietro Tacchi Venturi）將耶穌會羅馬檔案館中發現的利瑪竇義大利原文手稿，同其他書稿以題名《利瑪竇神父歷史著作集》（*Opere Storiche del P. Matteo Ricci*）刊行，共上下兩卷。1942年，德禮賢神父（Pasquale d'Elia）將其編入《利瑪竇全集》（*Fonti Ricciane*）。